



八十七岁自述

诸祖耿

我叫诸祖耿，江苏无锡人，汉族。

我生于己亥(1899)之年的三月，前一年是戊戌，后一年是庚子。我生之初，正当满清末期，行将革故鼎新之际。家世上辈富裕，到我则已全贫。祖父对杨先生兄弟五人，祖父最长。太平天国定都金陵，忠王李秀成镇抚苏、常，祖父以无锡绅士与李秀成部有结。太平天国覆亡，我祖父经人告发，指为“报国无凭，通贼有据”，流亡在外。我曾祖父孝升公，为此之故，



被捕入狱，死于狱中。我祖父住的房子，为清军全部烧毁。祖父临终作长联自挽，上下联末句云：“纵死不关心，恨我平生辱父母。托孤无别语，教儿为善耐饥寒。”我祖父善诗工文，书法在柳公权、黄庭坚之间，健劲圆润而有力。对联的稿子，现在还宝藏着。乡间有几处堂名匾额，是我祖父的笔迹，整饬刚强，表现了平生的骨气，可惜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

我父亲颂先府君兄弟二人，父亲是弟，我伯父桐轩先生是兄。桐轩先生九岁，我祖父逝世，我祖母盛太君含辛茹苦抚养孤儿长大，攻书上学，迄于成人。伯父工诗善书，薄科举而不应试。我父亲考上秀才，不到两年，由于肺病去世，那时只有三十

三岁，我当时只有五岁，我母亲和祖母把我抚养长大。

我从小就没有父亲，没有受到父亲的教育，但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极其深刻。父亲的遗物手稿，今尚珍存，考篮里，行篋中，朱墨烂然，手批书籍，一丝不苟。首尾完整的朱丝阑的考卷，以及他用过的笔墨砚台，无一不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，仿佛在教我要善继善述，无愧先人于地下。

族中有一位姊姊希贤先生，是一个杰出的女子，年纪轻轻，读了很多古书。她的哥哥金吉先生，和我父亲一样，也是进了学的秀才，我们乡间很少有人读书，只有他和我父亲是读书人，因此，两家来往，分外亲密。姊姊在家开了一个私塾，亲自教书。我六七岁时，母亲背着我送到她家上学。姊姊是我的启蒙老师。她常常教我说：“你的父亲怎样怎样的待人好，怎样怎样的读书。”诱导我，勉励我，她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。

科举废，学校兴，无锡城中，开了一所竞志女学，姊姊为了自己的深造，停了私塾，进城上学去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伯父和金吉先生，也就在我家里开了一所名叫求我的初等小学。于是，我就在求我学堂读书，直到初等小学毕业。

乡间没有高等小学，无锡东门有所东林高等小学。我要上高小，必须离家出门。我的祖母和母亲，担心我出门不惯，寄宿校中，又不放心，送我到东门外亭子桥，住在我姑丈华觉堂先生家中，早上进城上学，课毕回宿华家，中午在校午膳。

东林小学，原是明代乡贤顾宪成、高攀龙两先生讲学的地方，一进门来，就看到高高地矗立着的一座石牌坊，牌坊上一面是“东林旧迹”四字，另一面是“后学津梁”四字。“津”是渡口，“梁”是桥梁。我心中懂得如要读书向学，必须跟着两位乡先生走去，这就是“后学津梁”四字给我的启发。我在东林小学三年，所学功课，未敢落在人后，在古籍方面，连幼年所读在内，已经能够背诵大学、中庸以及大部分的论语、孟子。如何读

书，如何向学，也略略知道一些大概，自己觉得这是一条正路。

小学毕业，走那一条路呢？进中学罢，学费、宿费、膳费家中无力负担，不得已，只有考作师范生的一条路。那时无锡学前街有一所赫赫有名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，于是我便一心一意的投考这个学校了。

说也好笑！在我同班队伍里，有个高个子的排头姓宋的，也和我同样的去考第三师范。他每天起早睡晚地认真复习功课，准备应试。我呢，还是照常地贪玩，看小说，不把应试放在心上。到后来试毕发榜，我竟和他以同样分数作为案首第一名登在榜上。于是我很自负地踱进这所学校。

骄傲自满，自命不凡，这是很不好的！在这所学校里，从预科到本科，读到第三年的中间，用我自己造成的一个难关给我过不去了！

事情是这样的：

由于我有一点小聪明，遇事好发议论，同学少年，往往随声附和，因此造成了领导上的注意和不满。我在这所学校，开始还没有看出什么问题，后来知道的事情渐渐多了，知道在我入校之前不久，前几班同学闹过一回叫做“平社”的风潮，我自己觉得有些道理，课后闲谈，往往谈起这事。这就引起了一些当局的顾忌，这是一。对于学习，自己觉得考试容易应付，堂上听课，不很重视。特别对于语文，自己认为老师讲的都很平常，自己已经懂了，他却叨叨不绝的讲着，自己不够明白须要说清的，他却略略带过，以为这样听课实在没有什么味道，还是自己默默地偷看一点小说的好。我国几部著名的小说，差不多都是在课堂上偷看的。在堂上看小说，在课外夸夸其谈，特别在窃国大盗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那个时期，我更表现得高谈阔论，畅所欲言，校长怕我闹出乱子，把我和几个和我类似的同学软禁在校长室隔壁一所空屋里，除了上课等集体行动之外，不准离开此地一步。这就

使我简直不能忍耐了。这年年终，寒假开始，校长竟找我个别训话，说：“明年开学，你不必再来，我这里容留不下你这样的英才！你自己另找别路去吧！”我听完，不作一声，掉头便走。我很负气，没有想到这是他给我的警告，要我认罪讨饶。我以为这就是把我开除，我心想既然如此，此地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这样的学校我本来不想呆下去。读书在于自己，既然如此，我另想别路好了！于是收拾行装，负气地走出校门。上路回家。

在没有到家之前，顺便去向姑丈辞行，把这事告诉了他，并且说：“我不愿意呆在这种学校读书！活像猴子演戏那样，我正在用心学算术，一声钟响，又要改学英文，一天到晚这样那样，我实在不愿意干，我志在读书，以后我另找一个可以给我读书的地方好了。”姑丈毫不动气地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你有这样的志向，我一定给你找一条门路，不过一切在于自己，你必须用功才好。”

新年来到，我姑母姑丈来到我家向我祖母拜年。高兴地带了一封信给我，对我说：

“我把你介绍到荡口华氏私立鸿模高等小学去教书，你一面教书，一面好好读书，你必须自己努力，这是你眼前一条最好的出路，正月半一过，你带了这封信，雇一只船直接到荡口去上课，那里是我完全接洽好了，自然有人来接待你的。”

当时我眉开眼笑，手舞足蹈，真是说不尽的高兴。我祖母和母亲也是感到非常愉快。到了十九那天，我离开家门，到了荡口。

鸿模高等小学，是我姑丈的族人，他的弟弟华绎之先生士巽主办的。绎之先生的祖父子随先生名叫鸿模，是当地的名孝廉，家中藏书极多。这所高小开设在他们新立的义庄近旁，校舍宏敞，学生众多，是无锡私立学校中负有盛名的学校，所以我到这里，实在是喜出望外的。那时我虚龄十九岁，实足年龄只有十八岁。离开学生生活，参加到教师队伍，说老实话是有些胆怯的！

使我毕生难于忘怀的，是到校后的第三天，那时我独自一人

坐在给我单人住宿的一间窗明几净十分清洁的宿舍里，忽然看到明亮的玻璃窗外，一群学生，在探头探脑的向里面张望，他们是在窥看新来的教师。他们在交头接耳，他们在窃窃私语，……。

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！自己想：他们在窥探我、在批评我。从前我是学生，不满意我的先生；现在我是先生，倘若他们瞧不起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看！他们个子和我不差不多，有的还比我高些，说不定他们的年纪，有的要大我一二岁呢，这该怎么办？他们都是一件竹布长衫，我也是一件竹布长衫，所不同的，不过我在鼻梁上多着一副眼镜，难道凭这一点，就可以制服他们吗？唉！这怎么办？一个问题，像鞭子一样狠狠地抽打着我！

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转折点。在这个问题之后，我的回答是：“必须努力战胜困难，切不可败下阵来！我必须好好备课，好好教课，努力读书，加速提高自己。从此之后，我的确不折不扣的这样做了。同事中有的是举人，有的是秀才，我以一个没有毕业的青年学生混在中间，面子上觉得高兴，骨子里却十分担心。我那里可以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呢！

我上的，是高一高二的课，采用的教材，差不多都是我从前读熟的文章。我小心翼翼地上几天课，自己觉得还是能够应付，这样我的内心才比较安定起来。

上课比较轻松，作业按时批改，也没有什么困难。摆在眼前的，是自己努力读书，充实自己。好在上课，批改作业，所化的时间并不太多，一天更多的时间，可以用在自己的读书上。于是我有一个打算，决定每天要读十页生书，读完生书，依次温习昨天前天读过的生书。读生书的时候，本文和注解，一口气连续读下，温习的时候便不看注解，只读本文了。这样，差不多不到一个星期，当时坊间刊行的一本本古书，完全可以读完。我从“诗经”读起，然后把“尚书”、“周易”、“礼记”和“春秋三传”依次读完了，这化的时间并不太长，现在算来，不过一二年

罢！我有了这一笔本钱，自己觉得在教师队伍中，完全可以站得住脚。

同事中给我印象最深、鼓舞最大的是我的良友钱穆（宾四）先生。他比我大四岁，也是中学没有毕业就出来当教师的。他博览、雄辩，孜孜不倦的治学，循循善诱的教人，吸引着学校全部学生集中在他的周围。每到星期六晚上，同学围住了他，要他讲故事，他滔滔不绝地讲着，来的客人也往往给他吸引住了。他的充满着朝气的一股精神，实在是我各方面学习的榜样。

校主绎之先生对我看重，学生对我信任，我上了两年课，没有出什么问题，绎之先生索性把我接到他的家中住着，让我教他的一个女儿，两个侄子。这更有时间可以给我读书了。绎之先生把家里“拥书轩”所有的藏书，全部交给我管，让我自由翻阅。他知道我爱好绘画，把所藏名家手迹借给我看。他知道我喜欢写字，也把所藏的名家法帖，借给我临，后来又把我送回学校，在他校长名义之下，充当了主任。就是这样，我在荡口心满意足地住了九年。

希贤姊姊，竞志女学毕业后，升入北京女师大学习。女师大毕业到河南一带任教，颇有声誉。无锡县教育局特地把她请回来担任无锡县立女子师范校长。她要我答应帮帮她的忙，担任师范生的班主任导师同时兼教语文，随班上升，直到毕业。我答应了，于是离开荡口，来到城中。一个师范没有毕业的学生，现在来作师范生的导师，一个小学教师，现在来教中学，这使我感到兴奋。

在荡口时，我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，“新青年”、“向导”之类的刊物，我经常阅读。一到城中，和一群进步青年接触，首先我加入了“锡社”。“锡社”是当时无锡进步青年的一个组织。

在这之前，钱穆已经先我进城到第三师范教书。我的侄子晋

生，已经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，在无锡洛社乡村师范任教。于是我一个，晋生一个，钱穆一个，加上一个蒋锡昌，一个施之勉，都在城中，相约而为“读书会”，约好每月聚餐一次，选择名胜地点游览畅谈，交流读书心得，传阅读书笔记。这年岁在丙寅，就叫“丙寅读书会”。

在这期间，我尽心竭力地在学校教书，精神振奋，意气昂扬，全班同学思想开朗，专心向学，个个要求进步。我的姊姊非常满意。北伐军将到无锡，赶到车站迎接的，第一面旗帜便是无锡县立女子师范学校，而前列的前列就是我所领导的一群青年女子。

湖南农民秋收起义之后，全国各地农民都纷纷抬起头来了，无锡也不例外。乡间青年正在地下党领导之下，组织开会，向一个姓徐的地主清算一笔名叫“义济”的开支账目。当时我从荡口回家，我的侄子晋生也在外地放假回家。他们认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，邀请我们参加会议。我和晋生都被推为委员，前往徐家，徐家在群众压力之下，不得不屈服承认，答应从此之后决心把“义济”公开。

这件事发生在北伐之前，那时还在乡下教书，事过境迁，我已完全忘记了。“四一二”事变之后，徐家突然向我和晋生进行反扑，说我是共产党，向县政府控告，县政府传讯两次，我理直气壮地给予驳辩，结果我们胜诉了。

胜诉虽然胜诉，但是，我被称为“赤色恐怖”的危险分子，这名声却传遍全城，人们对我侧目而视，使我不能安心工作。

这时宁汉分裂，陆定一同志在汉口，他是“锡社”社员，我决心到汉口去看看，我与姊姊说明情由，由“锡社”出介绍信给我带给陆定一，阴历端午，我和过去在北伐军到无锡后认识的两位共产党员，一个姓丁，一个姓曾，此外还有两位女同事，一道上江轮西往汉口。到了汉口，汉口形势很紧张。陆定一同志事忙，

派人来看我，并转告我暂时住下，过几天再谈。过了一个月，我返回无锡。过后才知道，这时正是南昌起义的前夕。形势发展十分重要。懊悔不该这样的轻举妄动，草率地离开。回到家中，仍在原校教书。翌年，友人穆济波，出长南通中学。邀我教书，我到南通一年，济波辞职，介绍我给他的好友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，于是我到了苏州，做苏州中学的教师。

苏州中学，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全省重点中学，汪懋祖很能注意罗致人才，吴梅、钱穆，都在这里教书。这个中学，草桥头是初中部，三元坊是高中部。我开始在草桥教，后来随班转到三元坊，在毕业班开了选科“现代文艺”。

初到苏中，我在校刊上发表了到汉口去的四首七律“感事”诗。苏州当地著名文人吴江金松岑（天羽）先生看到了。一天，他问钱穆：“你校新到的一位教师某某，我在校刊上看到他的诗，很不差，你认识吗？”钱穆高兴地回答：“他是我的熟人，在小学里一道教书的同事。你想认识他吗？我叫他来见你。”于是我在苏州认识了一位文坛上的老先生，彼此过从甚密。

松岑先生，原名金一，早年思想就很进步，工诗善文，著有“天放楼文言”，柳亚子、陈去病都是他的学生。他很喜欢结交文人，凡是来到苏州的文人，都要去看看他，他总是殷勤地设宴款待。我就由他介绍，认识了当地绅士张仲仁（一麟）先生，外地寓公李印泉（根源）先生。

在苏州，松岑、印泉两先生给我的助力实在是很大的。松岑先生介绍我当侯官陈石遗先生衍的弟子。印泉先生介绍我当余杭章太炎先生的弟子。苏州原有“国学会”的组织，星期天有学术讲座，请人演讲，又出不定期的刊物“国学商兑”。主持其事的就是金松岑先生，而张、李二老，从旁赞助。苏州中学高中部的教师戴增元（镜澄）、吴契宁（得一），东吴大学的教师王佩诤（饗），桃坞中学的教师王乘六（心若），都和我一起参加了

“国学会”的活动。

我在苏州中学教书，同学非常欢迎，同事十分融洽，我和一群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交相启发。我讲“现代文艺”，推重鲁迅，被人呼做“鲁迅狂”。有几次进步同学给国民党的反动当局逮捕了，我一知道，总是为他们请托张、李二老设法营救开释，为此之故，激怒了反动的国民党吴县县党部，招我谈话，给我警告，说要我为国民党多讲一些好话。我说：“国民党所做的好事，昭然在人耳目，何必要我多说。我所讲的都是一本正经的大道理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？”这年的夏天，苏州中学校长吴元溱（子修），竟把我停聘了。

停聘的消息传出去的第二天，东吴大学教授兼私立振华女子中学教师的王睿，带着振华女中学校长王季玉的聘书跑到我家，见了面，开口就说：“齐放其大臣于诸侯，诸侯先迎之者，富而且强。我们振华缺少老师，季玉先生诚心请你去教，你意下如何？”我欣然地接了聘书。这年秋天，我到振华女中学教书。后来又回到东吴大学去兼课。

东北风声日紧，九一八事件发生，住在上海租界的太炎先生，北上京师，观察形势。在北京讲学事毕之后由京回沪，中途在苏州停留了几天，苏州国学会同人敦请讲学。先生感到苏州文人云集，向学心切。又感到苏州是他老师俞曲园先生晚年定居之所，又苏州是他早期在东吴大学教课的地方，旧地重游，留恋不舍，决定从上海租界迁居苏州。于是在苏州侍其巷买了一所房子。后来嫌侍其巷地方偏僻，屋宇简陋，又在城中锦帆路买了两幢楼房，以备晚年定居。苏州许多学者，都很高兴，相约请先生在苏州长期讲学。先生慨然答应，一面作星期讲演；一面在自己楼房之后，建造讲堂宿舍，创办“国学讲习会”。自说“我的讲学始于日本东京，当时就叫“国学讲习会”，这里现有“国学会”，应该稍有区别，所以冠以“章氏”两字。名叫

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。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成立以后，前来参加听讲的，全国各地都有，朝鲜、越南，也有人来，日本学人，亦有前来讯问的。在这期间，我和王馨、王乘六、孙世扬等始终在先生身边。孙世扬字鹰若，是先生的再传弟子，是先生高足黄侃季刚的得意门生，先生把他留在家中，教他的儿子章奇。这时，我辞去了“振华”的课务，住在先生新建的讲堂西面宿舍中，朝夕陪着先生。先生每次演讲，都由我在旁记录，分期刊行。又和孙世扬一道协助先生编印“制言半月刊”，任务颇为繁忙，但是精神却十分愉快，是我生平难得的快乐时期，明师益友，欢聚一堂，真是无比的幸福。

先生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在他身边，真是如坐春风。从游数年，任何场合，从未感到他有疾言厉色。早在我的幼年，已经知道他的名字，欣慕他的为人，“革命军序”，“中华民国解”，我早就读过。浙江图书馆雕版印行的“章氏丛书”，我曾经以重价买到一部，认真阅读，有好些地方，还是不大懂得，拜门之后，我亲到上海福州路先生寓所请益，但是次数不多，时间短促，印象不够深刻，这次亲炙在旁，群居、独坐，口讲指画，真是受益非浅。先生学问文章，高风亮节，卓然在人耳目，无须我来多说，只举一两件事，作为颊上添毫之助。

（一）先生晚年，所收学生，有几个是杰出的青年，先生对他们特别喜爱。常说中年以上的学生，门路已得，成就可见。青年学生，来日方长，前程远大，不可不特加青睐。又说：“譬如下棋，大国手不能培养出大国手来，只有二国手才能培养出大国手来，我很希望在我门下出几个大国手”。

（二）易箴前夕，带病认真讲课。这是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的事。先生讲演，照例是每天下午一点半起，滔滔不绝地，坐在讲台上讲着，一杯茶、一支烟，一讲就是三个钟头。这天中午，先生感到不适，吃不下饭。师母汤夫人说：“你午饭不吃，

课就不上了罢！”先生摇着手说：“饭可以不吃，学是不可不讲的！”照平时一样，讲了三个钟头。这天，晚饭也没有吃，卧在床上，一句话也没有，嘴里仅仅不断地发出“爵姆、爵姆”的声音。意思是在说“怎么怎么”。次日，十四日早晨八点，竟离开我们溘然长辞了。

诱导青年，专心向学，这是先生一贯的精神，真是使我难于忘怀。

先生注意养生，又精医理，一向没有生过小病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呢？原来先生鼻中生瘤，平时鼻音很重，经常鼻塞不通，逝世之前那天讲课时没有鼻音，声调特别清楚，谁知这里存在问题，鼻瘤破了，毒菌咽下肚中，从此发作，造成剧变。先生专心讲课，精神兴奋，自己不觉得，我们也未加注意，这总是我们在旁的人，维护不周所致。现在想着心有余痛。

先生既没，“讲习会”没有星散，继续办下去，“制言半月刊”也没有中断。直到苏州将要沦陷，我和孙世扬等禀承师母汤夫人的意志，把“讲习会”移到上海，在这基础上用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的名义，创办“太炎文学院”。章先生的老友蒋竹庄先生（维乔），当时担任“正风文学院”院长，给与“太炎文学院”不少助力，并且邀请我去“正风文学院”任教。我就同时兼任两个学院的课务。夏承焘、龙沐勋也来“太炎文学院”兼课。

上海成为“孤岛”，“太炎文学院”为敌伪所注意，几次派人前来拉拢，我们知道上海不能再住，决心解散“章氏国学讲习会”，停办“太炎文学院”，转移到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去。

印泉先生在昆明，出任云贵监察使督导抗战，打电报来约我，于是我从海道经过越南，来到昆明，在先生幕府做些文墨工作，同时，由他介绍，到云南大学去当文学教授。这时西南联大教授钱穆兼上云大的课。多年阔别，相见欢然。我到昆明不久，孙世扬应他的同门伍叔傥（侗）之招，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。

抗战胜利，日军投降，我从昆明赶回无锡，孙世扬亦从重庆来到南京，与伍倜共同办理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，约我任课。“临大”结束，我仍然到昆明和钱穆一道任云南大学的课。无锡荣氏私立江南大学开办，钱穆担任文学院院长，我们同到江南大学。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，学校院系调整，江南大学一部分归入东吴大学，一部分与无锡社桥头江苏省立社会教育学院合并，我到社教学院任课。在这里由同事张拱贵、陈志安两位同志介绍，加入了“九三学社”，后来，我被下放到省立镇江中学任教，在镇江三年，江苏省教育厅调我来南京江苏教师进修学校任课，这时是在一九五五年的秋天，此后进修学校改称江苏教育学院，教育学院又合并到南京师范学院，我就到了南师，一直到现在。

回溯往事，就是这样，从十九岁起，到今年八十七岁了，读几卷书，教几堂课，足足过了六十八年，中间很少间断。这将近七十年的漫长时间，坐食无功，虚靡廩粟，有什么长处足以陈述的呢？真是言之有愧。老实说来，不过是一个道地的教书先生而已，说是一个教育工作者，还勉强可以，说是学术工作者，则是远远不够的。

正因为自己是教书先生，教书读书是自己的本分，所以自己对于教书读书有一些自己的体会，但这说不上是学问。

一、教书。教书，主要在于教人。古人说：“经师易得，人师难求”，抗颜为师，俨然为人师表，身教重于言教，自己必须严于律己，不能有一些差错落在学生眼里。我以此格外小心，一切行动不敢随便。每逢上课，钟声未响，已经站在教室门前，时间一到，马上上堂，自始至终，一丝不苟的讲着，所讲问题不论大小，必须考虑周密，运用自己的言语，深入浅出的交代明白。使得学生听课注意力集中，始终精神饱满，讲者听者，仿佛合而为一。这在自己，是感到满意的。课外辅导，个别交谈，亦必恳切周详，不敢丝毫疏忽。因此学生印象，颇有好感。

二、读书。读书不完全是为了教书，主要是出于自私，要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。凡是古今名著，都在必读之列，即使精神不够，亦必全力以赴。特别对于基础课的书籍，基本功的文章，更加多化了一些力量。这里，对于读书的一个“读”字，自己还有一点粗浅的见解。以为古人常说“读书三到。眼到，口到，手到”。实在说这三到，是不够完全的。最主要的一个枢纽，在于心到。要做到心到，必须通过眼到，出以口到，用自己的声调，表达作者的神理，使得作者表达的文字，成为读者自己的语言，两者融化无间，才可以满足心到的任务。古人说：“读百遍义自见”又说：“好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子自知”。唐代诗人李商隐佩服“句奇语重喻者少”的韩愈写的“平淮西碑”说：“愿书万本诵万遍，口角流沫右手胝。”这都是对于别人的作品高声朗读的记录。杜甫自己也说“新诗改罢自长吟，”这又是自己朗读自己创作的写实。通过自己的声情，体会作品的内含，既是口到，又是心到，这实在是“读”字的重要作用。我很重视这一点，所以要求学生亦要在这一点多化一些工夫。

教了一辈子的书，读了一辈子的书，人家一定要问起你的学问、著作来了。关于这一点，自己当然不敢过于谦逊，但亦何能过分自夸，自我审察，真是感到微不足道。

早在幼年时期，自己已经懂得平仄，喜欢做诗。祖父工诗，伯父又爱吟咏，他的唱诗声调经常在我耳边荡漾，因此七八岁时，便能跟着哼几首旧诗，这样成为习惯，居然逐渐形诸笔墨，自己写作起来了“水明楼诗稿”一册，就是积累起来的一些成果，存诗二千余首，其中只有很少的几首，曾在报章杂志上发表，极大多数的作品，只是作为自己独坐自娱的东西，未尝出而问世。写诗之外，又喜欢弹古琴，绘山水，两者都是自我娱乐，用来怡情养性，谈不上什么学问。中年以后，认为这些都是在玩物丧志之列，琴，束之高阁，认为“但识琴中趣，何劳弦上声”；画，也辍不复为，

以为徒然为人作嫁，“可怜无益费精神”！就是写诗，也逐渐减少，不肯在这上面多抛心力了。

特别提一笔的，是我一部百余万字的“战国策集注汇考”的编写已经完成，现已排印付校，今冬明春，即将出版问世，这一件事必须在此交代几句。

关于这部书，我在幼年即已知道，记得十六岁那年，我初入师范学校，没有多久，即向老师询问：“我读了几篇战国策里的文章，明白爽朗，很是喜欢，我想通读全书，不知要注意那些问题？”老师摇摇头说：“这部书很不容易读，有两种不同的本子，篇目次序彼此不同，文字章节亦有差异。注解有的多，有的少，很不一致，读起来很费工夫，你所读到的，是几篇通俗易懂的选文，至于全书，是不大好读的！”我听了这话，并不因此灰心，反而感到好奇，引起勇气，一定要登上高峰，探讨究竟是怎样一回事。从此之后，图书馆里，旧书摊上，得借读，便借读，能购买，即购买。剡川姚宏本，缙云鲍彪本，先后来到手中。其它有关“战国策”的著作，亦陆续来到手中。我先把姚鲍两本，对读一遍，发现很多问题。又从几部“类书”及古书注解中查看引用“战国策”的文字，一一仔细核对，除字句差异之外，又查出许多逸文，是今本“战国策”里没有的，于是知道今本“战国策”已经不是刘向当时编定的三十三卷全书。刘向的书，传到北宋，本来已经缺少一卷，曾巩说：“求诸士大夫家，三十三卷复完。”现在看来，曾巩这话，不足为凭，很有可能当时在缺少一卷的三十二卷中，匀出一些篇章，凑成一卷来满足三十三卷的数字，“复完”之说，是用来骗人的。不然，何以类书及古人注解所引，多有今本“战国策”所没有的呢？

“战国策”本来是各个不同作家写作的集合，不是一个作者精心结撰、首尾完整的专著，全不全，完不完，问题是无足轻重的。但是，在这一点上，却可以帮助我们探求“战国策”来源的真

实情况。

刘向校书，当汉代中叶，在这之前不久，成帝派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更前，则高祖入关，萧何接收了秦皇朝的图籍。汉皇朝的书库，所谓“中秘书”的，是秦火以后，海内图书最大的汇集，其中包括秦皇朝没有统一以前，山东六国大批游士遗存下来的简策，有些是这些游士平时记录下来当时留作参考，便于学习的材料。这些材料，或多或少，有长有短，传说纷纭，颇不一致。相传有“苏秦法百家书说”，这名词，很可能这是战国后期山东六国联合抗秦时期，游士们歆羨苏秦而传布出来的各种说词，各种记录。例如现在的“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”一篇，其中对苏秦多所炫耀，有些话决不是苏秦的事实，结尾竟说：“人生世上，势位富厚，盖可以忽乎哉。”这，显然表现着当时游士们十分热中追求名利的心理，那里是苏秦自己的口吻呢？

刘向校书，三十三卷“战国策”的前身是中书六名“国事”、“事语”、“国策”、“长书”、“修书”、“短长”。这六种素材，可惜我们今天无法可以查看，顾名思义，“国事”，“国策”可能就是刘向所说“国别者八篇少不足”的依据。他依据这个本子作为底本，分别采取六种不同书名中的有关材料，“略以时次之”，除去他所说的“复重”，厘订成为三十三卷。他说：“中书余卷错乱相揉莒”。中书中为什么会有“错乱”、“揉莒”、“复重”的呢？正因为这些素材，来自各方游士，传说纷纭，并非出于一手，这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，经他改编，这六种书的本来面目，却从此失传，不可得见了。

刘向把这六种重新编定成为三十三卷之后，开好目录，写上序文，端端正正的送给皇帝，藏于书库，这事便算了结。

但是，在他后来，又写了一部“新序”，写了一部“说苑”。“序”是“编”的意思，“新序”等于说新编。“苑”的意义，类似于“林”、“说苑”等于以前韩非的“说林”。这两部书的

内容,刘向不能凭空捏造出来,一定有所依据,依据是什么?一定是在中书六种以外的皇家书库中保留下来的简策。由此可见春秋以后,秦火未及,从一群游士手中留给我们的文献素材,是相当丰富的,这些从人民手中来的文献,值得我们重视。

说到这里,我想提醒一句。刘向说:“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……”。这个“策”字应当如何理解?“战国策”的“策”字,我以为应当理解为“简策”之“策”!决不是刘向所说:“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君,为之策谋”之“策”。如果说是“策谋”之“策”,则现存的“战国策”中,很少是针对某一问题而作出来的“策谋”,如果说是“简策”之“策”,则这部书实在是战国年代一群游士遗留下来的“简策”,其中当然包括有些策士的出谋画策,无所往而不通了。

“战国策”编定之后,图书分类,有的把它归入春秋类,因为刘向说:“其事继春秋以后讫于楚汉之起”;有的把它列入纵横家,认为内容是一群游士们的口说录存。我仔细考虑,这两者都不十分适合。说“战国策事继春秋以后”,固然,这分材料,时间都在春秋之后,可是事迹呢?“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”,秦火一烧“诸侯史记尤甚”,现在无法证实“战国策”里的事迹,都是战国年代的信史,显然和春秋不是同类。说“战国策”是纵横家,情况固然有些相像,但是孟尝、春申、鲁连、陈轸、列御寇、田忌、庄辛之流,根本安不上纵横家的帽子。即使书中出现了苏秦、张仪,比重毕竟不大。把“战国策”录入纵横家,显然不十分贴切。有人认为“战国策”里的事迹,虚构,想像的成分比较多,既不是信史,不能归入春秋一类,又不能说是纵横家,不如列入小说家为是。墨学之徒的宋钘,“上说下教,周行天下,强聒而不舍”其书“宋子”收入小说家。“饰小说以干县令”,战国游士,本来就是这样的角色,所以“战国策”简直可以把它作为小说来读。关于这点,我倒有些同意。

以上是我对于“战国策”的一些粗浅认识，接着继续说明我对于“战国策集注汇考”的编写经过。

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手边既然聚集了许多有关“战国策”的书籍，同时又从类书及古注中搜出了一些“战国策”逸文，又把姚鲍两本对校出一些问题，于是想在这基础上通读全书。为了通读的方便，先做好人名地名两种索引，然后以姚本为主，分卷分章，进行剪贴。正文和注解分开，正文中不杂注解，正文贴完之后，依据正文先后次序标出数字号码，把注解逐项分条，抄录在正文之后，先高诱注姚宏注，次鲍彪注吴师道注，又次则金正炜的补释，以及张琦、程恩泽、顾观光等有关各方面的考辨，一一依次录入，凡是章节出入，文字异同，音读义解，一概都不遗漏，如有需要，自己加上一点案语。这样，一章章的剪贴钞录，直到三十三卷完毕，自己觉得对于通读全书，比较方便了，不必费力地东翻西阅，精神可以集中些，对于自己来说，是比较有利的。对于别人来说，也获得了一些方便。以上是我编写“战国策集注汇考”一书的交代。

其它著作，项目虽多，但绝大部分没有写成定稿，这里暂且不提。

我教了近七十多年的书。回想过去，十分荣幸，感谢社会人士给我的帮助；感谢历届同学对我的信任，抚心自问，自己有那些地方，足以对得起广大人民的呢？真是微末不足道。

学问两字，原是无边无际的海洋。饮河满腹，不过聊以自慰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居留在祖国国门之内，读了几卷古书，即使把古书读得滚瓜烂熟，也不过是道听途说，略知一些皮毛，什么是“国学”？“国学”的范围怎样？“国学”的内容如何？在我来说，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说清。何况这样伟大的国家，这样悠久的历史，这样众多的民族，长期以来，有分有合，有治有乱，结果总是分久则合，乱后必治。形成了这样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广

大辽阔的祖国，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维系着的呢？回答这个问题，要具备怎样广大精微的学问，才能圆满解决？我徒然教了一辈子的书，在这许多问题面前，真是感到十分渺小，无能为力。渺小固然渺小，但宏伟的愿望，不是没有。生平论学，孔氏而下，深佩孟轲、韩愈、戴震三家，认为这三家，摧陷廓清，功不在禹下。
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我们的先民，曾经说过这样的豪语。我们的先民，也曾经各自分头奔向这样的伟业。我虽不敏，心向往之。

现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继往开来，领导我们建设四化。今天是我们建国三十五周年国庆的前夕，我回想起来，党和人民给我的恩惠，真是言不能尽。三十五年来，生活安定，工作顺利，使我充当江苏省政协委员，使我充当江苏省人民代表，曾以先进工作者的名义出席首都全国群英会，亲身接到敬爱的周总理亲自颁发给我的奖品，所有这些，真是古语所谓“鳌戴山林，深知其重”。感奋之情，非言可宣。今天写作此文，坚决表示，愿以今后的岁月，全力以赴，加强学习，积极工作，为“四化”建设，多作一些贡献，多尽一点力量。

是否有当，佇候明教。

1984、9、25 于南京

